

《淮南子》“禹凿江而通九路”与九江山关联考释

孙友虎



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是继《尚书·禹贡》、《山海经》之后的又一地理名作。《禹贡》、《山海经》均载有“九江”，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有“九山”、“九水”，却无“九江”，仅在《淮南子·要略》中写有禹“剡河而通九歧，凿江而通九路，辟五湖而定东海。”文中“凿江而通九路”，是否与“九江”之名有关？（清）秦蕙田《五礼通考》卷二百二：“《淮南子》‘凿江而通九路’，《说苑》‘凿江而通九派’，太史公曰：‘余登庐山观禹疏九江’，而孔安国亦云‘江于此州分为九道’。在汉以前，九江故道尚存，故言凿江凿如此。”（清）胡渭《禹贡锥指》卷七：“《淮南子》曰禹凿江而通九路……寻阳自西汉以迄东晋，皆言大江至寻阳分为九江，禹之所凿而《浔阳记》《缘江图》，又各列其名。”淮南王刘安

所在的淮南国曾是秦时的九江郡，编撰《淮南子》当不会遗忘“九江”，秦蕙田、胡渭引证《淮南子》道出了其中的关联，江水“九路”当指“九江”。

“九江”作为水名、地名无争议，作为“山”之存在，其理由有三：

1. “九江”名列《禹贡》“导山”群山中，当为山。《禹贡》“导山”云：“过九江，至于敷浅原。”“九江”名列其中，水除“河”作为“四渎”之一外，甚至没提其他“三渎”，文中“九江”当不是“水”。“导山”除“河”、“海”水名外，涉及二十八个地点，已知有二十七座山，独余“九江”为水？若“九江”是水，何以言长江之支流，而独不言“主干”之“江”？1957年出土于安徽寿县的战国楚怀王所制“鄂君启节”，其中舟节西南水路铭文为“自鄂（今湖北鄂城）往，上江，入湘，入资、沅、澧、油。”并未言及“九江”，说明时至战国“九江”仍不是重要的运输水系。从中可知，《禹贡》之“九江”，当是山。

2. 《淮南子》“禹凿江”所“凿”之对象当为山。凿山之说，《禹贡》早已记之，且在古代多为沿用。《尚书注疏》载，“九江从山谷所出，其孔众多，言治之难也。”（宋）程大昌《禹贡论·禹贡山川地理图》：“九江之地，孔安国第言在荆，不指何地。至班固始定著在庐江属县之浔阳，应劭释

九江亦曰江至寻阳分为九，然汉寻阳之地在今蕲春县境，此地与彭蠡会江处，止二三百里，中间须有一山可名，东陵乃与经应。”这一疑问，“中间须有一山可名”，可能即是久已遗忘的“九江山”。

这一说法，还有对“凿江”之“江”为山的总体考察佐证。对《四库全书》“凿”之对象进行考察，输入“凿山”、“凿河”、“凿江”、“凿水”等关键词，结果发现：“凿”的对象主要是“山”或江、河中的障碍物。治理长江的一个亮点是疏通九江，《淮南子》云“禹凿江而通九路”，所“凿”之对象是与疏通江水相关联的“山”，因江水“通九路”而名之曰“九江”，而凿通之山则以水而名为“九江山”，当可信之。

3. 唐宋占星学家从天文角度认定《禹贡》“导山”之“九江”为山。唐人李淳风《乙巳占》卷三引纬书《洛书》将此二十八山与天上二十八星宿对应：“……（南方七宿）：井、荆山；鬼、内方山；柳、大别山；星、岷山；张、衡山；翼、九水；轸、敷浅原……”（宋）朱震《汉上易传》卷九《说卦传》亦载“荆山、内方、大别、岷山、衡山、九江、敷浅原，南方七宿。”尹荣芳《大禹治水祭祀真相——以《山海经》“日月出入之山”与《禹贡》“二十八山”为视角》（《中原文化研究》2018年第1期）一文指出：“《禹贡》二十八山中‘九江’被怀疑非山名。‘敷浅原’，孔《传》云：‘敷浅原，一名傅阳山，在扬州豫章章。’《禹贡》这部分总名导山，且二十七山皆山名，则‘九江’亦必山名也。则《禹贡》亦必有天文学之背景。”

山名九江者，《四库全书》至少有三处：一是浙江诸暨九江山（《施宿《会稽志》卷九）。二是江西南昌九江山（《江西通志》卷五十九）。三是淮城九江山（陈耀文《天中记》卷四十三）。这三山均与《禹贡》“九江山”无缘，仅从侧面证明了“九江山”作为大禹治水地之存在。

符合《禹贡》的九江山在哪？九江山与“九江”的地缘有关联。《禹贡》四次提到“九江”，知“九江”在荆州境

内，导山至衡山以后，始与九江相遇；导江至九江之后，始到达东陵。高师第《〈禹贡〉荆州所谓“九江”究竟分布在今何处？》一文考证，“西汉时已有东陵乡与西陵县的设置。例如《地理志》庐江郡下曰：‘金兰西北有东陵乡，淮水出（淮水当为濯水之误）。’此东陵乡，依据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西汉荆州刺史部，约在今湖北黄冈县西北。因此，以上所述东陵与西陵，可谓东西相望，也正好控制《禹贡》‘九江’的上下。”西陵与东陵之间，西汉有枝江县，其得名于“江泛枝分”（《水经·江水注》），其“泛”字恰恰道出了“九江”治理前之状况，且有长江支流沔水流经。“九江山”当为汉代枝江县与金兰县东陵之间的某座山，大约在今湖北黄冈、罗田、黄梅一带。

“禹凿江而通九路”，（汉）高诱注《淮南子》（《四库全书》本）卷二十一注云：“江水通则九。”刘文典、陈广忠、何宁等名家之注大都简约，均未涉及“九江”之名，或者说对治理“九江”在整个长江治理中的独特价值，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。

注《淮南子》不易，译《淮南子》更难，尤须注意其中之韵文结构。《淮南子·要略》云：“剡河而通九歧，凿江而通九路，辟五湖而定东海。”文中有“‘歧、海’支之合韵。”（张双棣《淮南子用韵考》）河“九歧”、“江”“九路”与“五湖”是大禹治水中的三个关键点，前后呼应。“九歧”之“歧”，意为叉开，李昉《太平御览》则引《淮南子》“流河而通九歧”及高诱注为“支，分”（中华书局1960年版）。江“九路”，指九江，也可泛指多路江水。为避开“九江”与“九路”连用之叠字，并植入“九江山”要素，我将该段翻译为：“疏黄河而分成九个支流，凿九江（山）而沟通多条水道，开五湖而注入东海。”

淮河文化的历史特色与创新

史向前



安徽地域文化一般分为三块，即皖北淮河文化、皖南徽州文化与皖中的皖江文化。其中，皖北淮河文化最为久远而厚重，在安徽地域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。一个地域的文化传统是该地域的突出优势与发展力量，但也是需要辩证性的扬弃与创造性的转化。分析淮河文化的历史特色，促进淮河文化的创新发展，对于坚定文化自信、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具有重要意义。

淮河文化的历史特色

淮河是道家文化的母亲河，安徽境内的淮河两岸自亳州、阜阳至淮北、淮南一带的皖北地区养育了管子、老子、庄子、淮南子、陈抟等不同时代的道家思想代表人物。由此给淮河流域奠定了道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文化取向的种种特点，成为淮河流域最主要的文化基因。

其一，历史悠久，农业发达。中国文化历史悠久，但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不尽相同。大概言之，则有质朴与文华之分，这从炎黄二帝始就初步形成。炎帝因教民农耕、制陶、医药，故谓之“神农”，炎帝神农氏族创造了中国的农业文化；之后的黄帝因制作衣冠、宫室、文字，创造了中国的礼乐文明，被称为“人文始祖”。农业文化当然也是人文的一个方面，而且是根本的方面，但相对而言“质而少文”。这是滋生道家思想文化的经济基础。淮河流域正是炎帝部落势力长期统治与影响的地域，也是我国农业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，“中国原始第一村”安徽蒙城尉迟寺新石器遗址，就充分展示了淮河流域原始农业5000多年前的灿烂文明。

其二，民性质朴，行为好义。道家文化影响下的人生取向是自然纯朴，不假文饰，重农轻商，尚勇争气等。这些文化品性或文化取向都是由“直道”而来的，故一言以蔽之，曰“直”。但“直”在古代文献中有直率、正直两种含义。直率即率直、率真，这是人生的天然之性，而正直则是就直于道、直于理而言的。从包括地方志在内的有关淮河民性的历史记载看，说的最多的是“质直”，与此相关的还有“朴直”“悍直”等。孔子曰：“质直而好义”，说的是性情直朴的人处处喜欢义、追求义。《国语·周语下》曰：“义，文之制也。”韦昭注曰：“义，所以制断事宜也。”这是关于义的最早解释，也是后世对义的标准界定。“义”之所以为“义”，首先就在于“制断”，也即果断、果

敢。制断的一大表现是担任、担当。从古代农民起义的发端，到当代农村改革的发源，都是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担当起来的。制断的另一表现就是坚守、坚持，表现在文化上就是自足、自信，重传统、传承，不会轻易受到外部文化影响。

其三，生命茁壮，英雄辈出。“自古淮上多豪杰”，楚淮除了地广人众、经济雄厚等外在因素，更有其道家文化基因的内在原因，因为不失人生原有的茁壮生机与直朴本性。淮河人最突出的特点是体型高大、胆力绝人、生活简朴、豪气干云、讲义气、重友情。他们敢于反对强梁，以至革命起义；或者坚守不移，无外慕之好，也无流俗之弊。从陈胜、吴广，到项羽、刘邦，都是淮河文化孕育出的杰出人物。汉唐以后，同样是人才辈出，屡屡左右了中国的政治与军事舞台。正如梁启超所说，“有健全之肉体，然后活泼之精神生焉；有适宜之地理，然后文明之历史出焉……淮河流域，阴阳阴合，为我国数千年来政治史的中心，其代产英雄，龙跳虎卧，为吾国数千年人物史的代表。”

淮河文化的创新

淮河文化不能完全等同于道家文化，但道家文化是淮河文化尤其是皖北地域淮河文化的重要基因与底色。因此，实现淮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，要在把握特色的基础上，辩证取舍、推陈出新，使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、与现代社会相协调。

1. 建设文化淮河，促进文质统一。一般认为儒家重文，道家重质，其实这并不全面。老子只是对“文胜质”的虚伪现象进行清醒的批判，但并不反对文；孔子强调的是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。推动淮河文化创新，就是要全面把握和吸收优秀传统文化，并倡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，推进文化观念创新，文化内容创新，文化业态创新，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，建设文化淮河，让“质直少文”的农耕文化、“重质”的传统道家文化走向文与质的高度统一，全面提升群众文化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。

2. 提炼文化精神，弘扬正直正义。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，需要具体分析，辩证取舍。淮河文化品性有“质直而好义”的特色，但这里的“直”与“义”，贵在正直与正义。这就要求顺理而行而不是率性而为，遵从文明礼仪和规范，遵守社会规章制度。因此，要总结提炼好淮河文化精神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道德，引导人们明德、守公德、严私德，重品行、正操守、养心性，“以古人之规矩，开自己之生面”，为淮河地域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有效的社会治理与良好的社会秩序。

3. 坚定文化自信，铸就新的辉煌。人类的文化是多样的、动态的。传统文化应该是活态的，与时俱进的。淮河流域的道家文化本身，从老子到庄子，再到黄老道家、魏晋玄学等，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丰富发展的。推进文化创新，就要坚定文化自信，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结合起来，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活力，在继承中转化，在创新中超越，努力铸就淮河文化新的辉煌。

浅谈淮河历史文化中的几个人文内涵

淮河柳

淮河形成的时间在一万年以上，淮河流域以其较早的农业文明，加上地处长江、黄河两大流域之间，南北文化的并蓄，孕育了特有的信阳历史文化。千百年来，信阳人杰地灵，淮河之水滋养了大批杰出的历史文化名人。大批信阳历史文化名人的涌现，不断丰富了信阳历史文化的内涵，也使信阳历史文化人文内涵具备了突出的特点。

人文内涵之一：友善

淮河与长江、黄河相比，主干流程较短，只有一千公里，但在主干流两侧却支流众多，流域面积甚广，因而水系发达。这是地域特点形成的一种吸收与接纳。淮河流域在夏商之际及以后的西汉、三国等朝代曾涌入了大量的移民。民族的不断融合互补，创造了淮河流域灿烂的农业文明和淮河文化。这是不断的征战造成的一种吸收和接纳。吸收和接纳，包容与融合，形成了朴实、敦厚的民风，这民风的根本和基调便是人的友善。友善在孙叔敖、管仲、司马光等文化名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

传说孙叔敖年少的时候，在地里锄地，突然看见一条两头蛇横卧在路上。他曾听人说，两头蛇是不祥之物，谁若碰见就活不成。他暗想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不让你活着再去危害别人，于是就挥锄将蛇斩死了。为人着想，冒险除害，既是勇敢，也是友善之举。

被传为佳话的“管鲍之交”，说管仲、鲍叔牙合伙做生意，分钱时，鲍叔牙让管仲多取言其家贫。管仲三次当官三次被罢免，鲍叔牙为他解嘲说没遇到好机缘。管仲三次作战三次败北，鲍叔牙为他打圆场说家有老母。后来鲍叔又向齐国国君推荐管仲做相，自己甘当管仲的副手。这个故事过多地褒扬了鲍叔牙，其实，如果管仲不是知情识义的友善之人，鲍叔牙能和他结为知己吗？那管鲍的“莫逆之交”也就不会千古传颂了。

“司马光砸缸”更是妇孺皆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故事。年纪小小的司马光在小孩掉进水缸里，其他小孩惊恐万状、四处逃散之时抱起石头猛砸缸，使小孩很快得救了。其时他所表现的不仅仅是机智，更重要的是友善。后来，司马光任宰相，和新法的提倡者既是政敌，又是诤友，在变法斗争中，虽是政敌，但却友善相处，礼遇对方，光明磊落，决不暗中伤害，其待人友善情深，为后人所称道。

人文内涵之二：自律

淮河主干、支流航道，通航历史久远。船行河上，驶船人须知风水，胸有成竹。货装多少为止，何时起航为宜，什么风向打什么帆，什么水流掌什么舵，何地停泊有利，怎样卸货最佳，都约定俗成，有规有矩，驶船人要条律恪守、牢牢遵守，不可忽视造次。自由与限制，放纵与收敛，在船与水的关系中处理的是那样和谐与自然。淮河文化受其影响，在其人文内涵中也就自然带上了自律甚严的色彩。这种严于律己的品行在孙叔敖、费祎、何景明等文化名人身上都可以找到。

孙叔敖虽任楚国令尹，但为官清廉，不积家私，死后“其子无立锥之地，贫困负薪以自炊之”。由此引发了“优孟衣冠”的悲喜剧，说的孙叔敖之子偃一日打柴归来，碰到楚宫里专门为楚王娱乐的优孟。优孟见偃这般穷困，甚是过意不去，便穿戴孙叔敖的衣冠，模仿其神态，往楚庄王前祝寿。庄王大惊，以为孙叔敖复生，要他继续当令尹，优孟这才趁机讽谏，感动了庄王。庄王于是召见孙叔敖之子，封之寝丘400户。遵守法度，严于律己，使孙叔敖成了清官，落了个两袖清风，留下了令后人啼笑皆非的故事。

蜀国尚书费祎在诸葛亮去世后担任着蜀国的军政重任，他不仅自律甚严，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，要他们布衣素食，出入不骑马、不坐车，和平民百姓一样不搞特权。律已能清廉，清廉能生威。费祎在任期间能出将入相，号令三军，继续诸葛亮未竟的事业，为后人所称道，与其严于律己的品行是分不开的。明朝的文坛领袖何景明，作为皇帝的钦差大臣出使滇南归来，不取地方官吏贡献的一金一物。就任陕西还里时，《明史》也明确记载“官囊不满三十金”，这在“一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的封建社会官场中真是难能可贵啊！

人文内涵之三：勤奋

淮河支流众多，在干流两侧呈明显的不对称分布：南侧支流，河短流急，水量丰富，暴雨时易形成洪峰；北侧支流，源远流

流长，弯多水浅，流速缓慢。两侧支流的汇入，就使淮河干流或呈现出激流勇进奋发的态势，或表现为历经磨难自强不息的风貌。两侧流域若雨水过多，极易形成洪涝灾害，人们反复耕种勤奋劳作才能收获。因此体现在淮河文化的人文内涵中便有了永远的勤奋，像淮河流淌一样日夜不息地向东方流去。

三国时期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诗人曹操，勤奋好学，于戎马生涯中手不释卷，尤喜读军事和文学著作，曾反复阅读《孙子兵法》，并予作注。爱登高赋诗，又懂音乐，今存的二十多首乐府诗，人们仍十分喜爱。

司马光勤政闻名，任宰相后更是“躬亲庶务，不舍昼夜，欲以身殉天下。”而在修史著述方面，其勤奋之至，更是世所罕见。为编纂《资治通鉴》他耗费了19年的心血，这部史学巨著上起周威烈王（前403年），下止后周世宗显德六年（85年），横跨1362年历史，真是宏大无比，浩如烟海。司马光说：“臣之精力，尽于此书。”书成之时，司马光“精疲力竭，牙齿所剩无几。”其耗时之长久，其笔耕之艰辛，其付出之巨大，令后人肃然起敬。

清朝状元、植物学家吴其濬在全国许多地方做过官，为官时，仍潜心研究植物，每到一地都采集植物标本，并向当地劳动人民请教，对罕见植物不仅观其形，还尝其味；对可疑植物，虽经研究比较，仍不能肯定的下结论。辛勤的观察研究和严谨的治学精神，成就了植物学巨著《植物名实图考》。

人文内涵之四：忧患

淮河没有直接入海口，历史上须展转入长江而后入东海。因此汛期常泄洪不畅，使流域内不少地方形成洪涝灾害，有时水患连年，庄稼绝收，房屋倒塌，人们流离失所，不能安居乐业，久而久之便使人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耕种了能不能收获、住下了能不能安心的对水患的忧虑情绪。这种健康的忧虑情绪反映在淮河文化的人文内涵中，也就是较为正常的忧患意识了。忧患意识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息夫人、蒋光慈等文化名人身上。

传说美貌倾城的息夫人虽是女流之辈，却素有大志，嫁给息侯后，见息侯疏于政事，心怀忐忑，忧国忧民之心痛痒不忘，就想想方设法劝息侯，息侯听了劝导，使息国慢慢走上了自强的道路。后来，蔡侯为讨好楚王，极力向楚王称赞息夫人貌美，好色的楚王便以武力将息夫人抢去作夫人，息侯不堪蹂躏而死，息国自此灭亡。息夫人在楚为楚王生了两个儿子，但终日怀念故国，牵挂息侯，三年不语，最终自尽而死。“三年不语”，既表现了息夫人坚强的反抗意识，也足见她为国为民为家的深深的忧愁思念。

现代诗人蒋光慈很早就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，当中国的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，就以“时代的忠实儿子”“暴风雨的歌”的姿态跃居文坛，他的不少文艺作品鼓舞激励一代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，但也流露了不少哀愁和忧郁，如《新梦》、《少年漂泊者》等，这也是忧患意识的一种体现。

淮河历史文化在其发展进程中经过许多文化名人的发扬和完善，不少人文内涵已成为传统文化的精华，影响和规范着人们的精神行为，绽放着熠熠夺目的人文光辉。近年来，信阳各项事业蒸蒸日上，不断繁荣，尤其是“五个信阳”建设目标的提出，更加鼓舞人心。在高层次的魅力信阳建设中，如果我们能不断汲取淮河历史文化中的人文内涵，以友善、自律、勤奋、忧患等人文精神鞭策自己，激励自己，鼓舞自己，更会使我们的“五个信阳”建设动力取之不竭，用之不尽。

